

金生杨

摘要：退溪《周易释义》、《启蒙传疑》二书分别从义理和象数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易学思想。在《启蒙传疑》一书中，退溪深刻地阐明了他对象数易学的认识，提出了一整套研究象数易学的方法，并将之用于实际研究之中。通过对退溪象数易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清理，我们可以看出，退溪虽然将朱熹所批评为“支蔓”的象数易学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，并有“深泥”的弊端，但在主体上，他的象数学仍然以探究“理”为准的。《启蒙传疑》一书为我们理清了象数易学中的一些繁琐疑难的问题，其方法和成果均具有指导性意义。

关键词：退溪；朱熹；易学；象数；《启蒙传疑》

李退溪（1501-1570）是韩国李朝时期著名的朱子学大师。他的学问博大精深，对理学和理学史有着全面的把握和深入的研究。在易学上，退溪有《周易释义》、《启蒙传疑》二书，分别从义理和象数的角度对其易学思想作了阐发。在其文集语录等作品中，有关易学方面的论述也为数不少。退溪是宗主朱子的学术大师，在易学上也明显地带有浓厚的朱学色彩，不过，正是在易学上，退溪又展示了他独具己见和兼融百家、综合创新的一面。他的象数易学尤为博大深厚，对朱子的象数易学作了很大发展。学者们已对退溪的易学有了初步的探讨[①]，笔者不揣浅陋，试就其象数易学略述一管之见，望方家指正。

朱熹在易学上，义理宗程颐，所以《周易本义》一书重在阐发其“《易》为卜筮之书”的《周易》本义上。朱熹说：“伯恭谓：‘《易传》理到语精，平易的当，立言无毫发遗憾！’此乃名言。”[②]“伊川晚年文字，如《易传》，直是盛得水住！”[③]程颐《伊川易传》在讲道理上字斟句酌，阐释“天理”甚备，朱子解《易》就不可能再作重复建设。所以他在《周易本义》中时常称“程《传》备矣”[④]，并对弟子说：“某之《易》简略者，当时只是略搭记。兼文义，伊川及诸儒皆已说了，某只就语脉中略牵过这意思。”[⑤]不过，程颐《易传》也有不足。朱熹说：“《易传》义理精，字数足，无一毫欠阙。他人著工夫补缀，亦安得如此自然！只是于本义不相合。《易》本是卜筮之书，卦辞爻辞无所不包，看人如何用。程先生只说得一理。”[⑥]“《伊川易传》亦有未尽处。当时康节传得数甚佳，轻之不问。天地必有倚靠处，如《复卦》先动而后顺，《豫卦》先顺而后动，故其《彖辞》极严。似此处，却闲过了。”[⑦]程颐《易传》舍弃象数不言，即使是经常交往的邵雍的易学，程颐也不过问一句[⑧]，所以在象数方面，程颐的《易传》就有所不足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朱熹认为《易》本来就是卜筮之书，程颐没有把握到这一本义，所以朱熹称《伊川易传》可以单独成书，不必附于《易》[⑨]。为了弥缝程颐的不足，朱熹把重点转到发明《易》的本义上，对象数学尤所偏好，《易学启蒙》一书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作。

退溪继承朱子，对程颐《易传》多加推崇，对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、《通书》的易学阐发也研究深入。他称赞程颐、朱熹“两先生皆大有功于《易》学者”[⑩]。他的《周易释义》主要就是从业理的角度阐发《周易》蕴义，虽然文字简略，但综合创新之处甚多。退溪对象数

易学的探究集中在《启蒙传疑》一书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一般的易学家，大有专精深微的味道。他在象数易学领域中对朱子学的扩展性论述更是揭前人诸疑，发前人所未发。

一、对象数易学的认识

朱熹说：“《易传》言理甚备，象数却欠在。”[11]他不仅在《周易本义》卷首列象数十图，而且还与蔡元定商讨易学，著成《易学启蒙》，专门探讨易学中的象数问题。他甚至还力求探索邵雍易学渊源，深入研究《周易参同契》，为之注解释疑，以发掘其中的象数易学之蕴。不过，朱子的象数易学比较纯朴，对汉代象数易学的傅会，他有很多保留甚至是反对的意见。

相比而言，退溪的象数易学就要复杂繁芜得多。他对朱子虽知而不赞同的一些象数易学内容也纳入到了《启蒙传疑》一书之中。这与退溪对象数易学的认识有很大关系。退溪认为象数易学广博微妙，难于穷究。他说：“理数之学，广博微妙，盘错肯綮，未易研究，透得一重，又有一重，愈索而愈无穷。”[12]（第1页）正因为如此，所以退溪虽以“《启蒙》之书，阐发幽赜，昭如日星，而诸儒辩释，又皆精密该畅，无遗憾”，但仍“因思有契，或考古有证”，“随手札记，累至成帙”（第1页），写就《启蒙传疑》一书。

具体而言，朱熹曾言及《周易参同契》、《易林》、《火珠林》等书。他对《参同契》作过注释，但称其书本不释《易》，仅托《易》以言炼丹，所用纳甲之法有合于《易》而已。朱子又认为《易林》、《火珠林》有古《易》遗法[13]。但他赞许程颐思想纯正，没有见过《火珠林》，所以一遇成都隐者言《未济》“三阳失位”就为之动[14]。在《易学启蒙》中，朱子赞同蔡元定十图九书之说，一改刘牧九图十书，所援引虽有关朗等人之著，但也不为太杂。退溪则有所不同，虽然他主要依据韩邦奇《周易启蒙意见》一书，但援引之说除了吴澄（临川吴氏）、黄幹（勉斋）、刘燊（云庄）、鲍宁（谥斋）、胡方平（玉斋）、胡炳文（云峰）等人外，更有医学书《素问》、算术书《杨辉算法》等，甚至明言：“图虽无文注纳甲法，法见阴阳家诸书。今取《参同契》及《笔谈》、《易髓》、《卜筮元龟》诸图说，以愚见订解如左云。”（第70页）其《杂书考证》一篇则是专门针对《卜筮元龟》等杂书所作的考证。这显然是援引杂书，尤其是阴阳家诸书入象数易学领域，其失之于驳杂是不言而喻的。

从退溪对一些传统解《易》方法的态度上，也可以看出他用驳杂的方式对朱熹象数学的发展。其一，对互体、飞伏说的认识。朱熹说：“纳甲是震纳庚、巽纳辛之类，飞伏是坎伏离、离伏坎、艮伏兑、兑伏艮之类也。此等皆支蔓，不必深泥。”[15]“不必深泥”就是不要过于推求，所以朱熹并没有否认互体、飞伏之说。他自己还用此以解《易》，称：“凡卦中说龟底，不是正得一个《离卦》，必是伏个《离卦》，如‘观我朵颐’是也。‘《兑》为羊’，《大壮卦》无《兑》，恐便是三四五爻有个《兑》象。”[16]这里不仅以“观我朵颐”是因为《颐》“虽无离卦，却是伏得这卦”，而且以《大壮》三四五爻互《兑》解释爻辞中有“丧羊于易”的问题[17]。不过，一旦以伏卦、互体过于深求，朱熹就表示反对了。他说：“朱震又多用伏卦、互体说阴阳，说阳便及阴，说阴便及阳，《乾》可为《坤》，《坤》可为《乾》，太走作。近来林黄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体，一卦可变作八卦，也是好笑！”[18]朱震《汉上易传》“太走作”、林栗《周易经传集解》“好笑”，关键就在于他们在伏卦、互体上处理不当，牵强傅会太多，所以朱熹对之不满。退溪在这方面也有过于深究之嫌。他不仅列出《推飞伏例要诀》，而且称“要诀隐晦难推，今以乾坤二宫为图，以明

如左”（第78页），力图将飞伏之例一一弄明白。

其二，对纳音说的认识。朱熹对纳音说持保留意见，认为其说有理，但又有很多矛盾之处。在具体解说中，他采用得较少。《朱子语类》载：“鲁可几曰：‘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谓《火珠林》之类否？’曰：‘以某观之，恐亦自有这法。如《左氏》所载，则支干纳音配合之意，似亦不废。’”[19]又载：“乐之六十声，便如六十甲子。以五声合十二律而成六十声，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。若不相属，而实相为用。《遗书》云‘三命是律，五星是历’，即此说也。只晓不得甲子、乙丑皆属木，而纳音却属金。前辈多论此，皆无定说。”[20]朱子认为音律与干支虽不相属，而实相为用，二者有共通性，而且《春秋左传》有所记载，所以他不废纳音之说，但在解释中却少用此说。退溪则对纳音有深入的探讨，他引入医书《素问》、算术书《杨辉算法》，就是想搞清楚纳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此外如“五运”、“六气”之说，更是朱熹少有涉及者，退溪则一一引证说明。

其三，对纳甲的认识。朱熹说：“京房便有纳甲之法。《参同契》取《易》而用之，不知天地造化，如何排得如此巧。”[21]他推求《参同契》，认为纳甲诸卦“与月相应”，“以十二卦配十二月，也自齐整”。朱熹对《参同契》的认识处在取舍之间，他明确地说：“《参同契》本不为明《易》，姑借此纳甲之法，以寓其行持进退之候。”[22]然而，既托《易》象以言炼丹，《参同契》又难免有易学成分，所以他又说：“此虽非为明《易》而设，然《易》中无所不有。苟其言自成一家，可推而通，则亦无害于《易》。”[23]退溪在纳甲法上作了极其深入的考察，他比朱熹专门考究《参同契》走得更远，取用了《梦溪笔谈》，乃至《易髓》、《卜筮元龟》等阴阳家诸书一一推寻，对已由儒入道的“全阳子俞琰”之说也引述不已。在追求与造化同齐上，退溪深明朱子之意。他以为八卦纳甲只有四十八甲子，与六十甲子相差十二位，与造化不合。为此，退溪作出了新的阐释，认为：“乾坤二卦，又纳壬癸十二支，如乾卦初爻，甲子与壬子同行，坤卦初爻，乙未与癸未同行，方得全备也。”（第167页）

不过，退溪仍然力辟琐碎和立异之说。他在阐述自己著《启蒙传疑》时说：“尝观苑洛子《意见》书，可谓有功于《启蒙》，亦近世难得之书也。但为图太碎而无甚发明，为说太深而好立异议。今择其要义若干条著之，余不敢效其所为，览者详之。”（第1页）苑洛子即明韩邦奇（1479—1555），字汝节，号苑洛，朝邑（今陕西大荔）人，正德三年戊辰（1508）进士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，谥恭简。《明史》卷201《韩邦奇传》称其“性嗜学，自诸经、子、史及天文、地理、乐律、术数、兵法之事，无不通究”，所著有《苑洛集》、《见闻考随录》、《志乐》、《易学启蒙意见》等。《易学启蒙意见》一书一名《易学疏原》，今《四库全书》收录。全书分“本图书”、“原卦画”、“明蓍策”、“考古变”四卷，多有异于先儒之说者。退溪认为韩邦奇《易学启蒙意见》在注解《易学启蒙》上虽然有功，但其失也多，自称“不敢效其所为”。所以，他与朱熹朴素的象数易学思想还是比较接近的。在《六气》一篇中，退溪虽然引《素问》注解胡氏引文之义，但认为六气之说，“本不足尚，姑举其略，以释胡氏所引之义”（第14页）。这也反映了他不好异说、反对琐碎。

退溪反对立异，他批评前人，又严格要求自己。在《再详朱子胡氏分四隅卦不同之义》中，退溪不但推学者异同的本旨，而且推求学者立异的用意。他说：“韩氏《意见》多与朱子异同。……大抵韩氏意本以攻玉斋设，而更不惮立异于朱子如此，鉴者详之。”（第48—49页）韩邦奇立异在于攻驳胡方平，所以就不忌讳与朱熹《启蒙》立异。退溪指陈这一用意，实际上是提醒读者应该在学术上保持平和的态度，要区别对待，以意逆志。韩邦奇有《洛书

七八九六迭为消长图》，在释《洛书》方面，“多有晦紊难通处”，退溪则为之解棼，发明其意，而称“非取欲有异于其间也”（第31页）。这就是退溪要求自己不立异于人的表现。在变占问题上，朱熹以四、五爻变以不变爻占，退溪怀疑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以七、八为占，与《易》用九、用六之义不相应。他看到韩邦奇《启蒙意见》也对此有疑问，与其疑问相应。但退溪并不象韩氏一样，轻率立异，而是说：“朱子岂虑不及此而立无义之占例哉？”称“当时既无问辩之者，今亦未敢强其所疑以为是”。他引韩氏之说，也不过是“广异闻，以俟后日之考订”（第152页）。退溪还驳斥韩邦奇改朱子三爻变用象辞，以为三爻才小成之说，认为三爻变也是“六爻既毕而观所变只三爻”，不可能只得三爻小成而定所占之爻象。为此，退溪揭发其弊而不苟同其说：“苑洛不惮立异于先正而轻论之，今录于此，非取其说也。”（第153页）可见，退溪在反对立异上态度坚绝，作风端正。

退溪曾说：“金慎仲惇叔、琴墟之、禹景善及孙儿安道皆会，共读《启蒙》，相与研究讲论，多见到前所未有处。至昨方罢去，可乐也。但象数者，至理所寓，精微深妙，亦非身外事，然却被日夜留心于此，亦觉德性上工夫不能专一，不无害事，而况他事乎！”[24]《启蒙》一书值得深入玩味，有“可乐”之处，但退溪仍然以“理”为象数易学的宗旨和核心所在，认为日夜留心于象数，与德性修养功夫还是隔了一段距离，故有害事之嫌。

二、象数易学研究方法

象数易学繁琐复杂，深奥难懂，向来被学者视为畏途。在具体的象数易学研究方法上，退溪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，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象数易学极富指导意义。我们就其所言，列为以下数种略加讨论。

（一）参订异同，得其归趣

《周易》历经千载，学人注疏不辍，异同明显。学人对于《周易启蒙》一书的研究亦复如是。退溪认识到这些异同，而且力图解决这些歧义带给阅读者的不便。为此，他采用了参订考证的方法，审其异同，以求其是，各还其真。

退溪注意到黄幹对五行分属阴阳的说法有三种。第一说以坎水属阳，离火属阴，乃就五行“生之序”而论，木亦阳，金亦阴。第二说以水有形属阴，火有气为阳，木为阳，金为阴，乃就五行“行之序”而论。第三说以水与貌属精为阴，火与言属气为阳，又以木属精为阴，金为阳。退溪考察其异同，认为第三说与第一、二说均不同。他究其原因，认为五行阴阳生成可以互易，但这是就未离乎气而言，一旦有了定质，则阴阳为定，不可移易。他还引《太极图解》、刘燾等说为证，以明黄幹第三说“未得为确论”（第17页）。

胡方平、胡炳文均对《启蒙》一书有过注解，但二者时有异同。退溪说：“观云峰胡先生《启蒙通释》，凡玉斋之言，发明至到者，悉采入。独于余所疑者，并无所载，于是服云峰之高见，所疑顿释。”（第23页）尽管如此，退溪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胡方平之说，而找出了其说的合理之处，称“玉斋之辨，虽与朱子稍异，亦各有义”，而以谥斋“攻玉斋太苛”，自己“只依玉斋之说，条释如左”（第23页）。退溪认为于理数之学，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必须参订而后得其归趣”（第1页）。他对胡方平、胡炳文及鲍宁诸说异同的考订，理清了各自的思路，没有因为胡炳文、鲍宁的反对意见而罢，最终见到了胡方平的合理之处，理解到学者“言各有当”，其研究方法确实高明。

退溪对“三同二异”、“析合补空”的阐释更显示了他参订异同，得其归趣的研究方法。他说：“二说不同者，盖朱子主生数而言，胡氏主成数而言故也。然要其归，两说相须，其义始备。”（第29页）在《与金惇叙》书中，退溪对此还作了进一步解释，以证注中“主成数言”之“成”字不误[25]。退溪又说：“易图说此章注，朱子之说与胡氏说互有异同。今且先以横图，明朱子之说，次而条析两说所以异同之故，然后乃为二图，附说于其后，以备遗忘云尔。”（第34页）胡方平与朱熹对“三同二异”、“析合补空”之义说法有异同，退溪没有舍此即彼，或全加否定，而是推求出现异同的原因，考究其用意，确实把握了朱、胡二人各自的归趣。其治学之谨严独到，虚以求其旨归之心跃然纸上。

此外，《两说异同之辨》、《再详朱子、胡氏分四隅卦不同之义》均是退溪就朱熹与胡氏异同之说作的参订工作，并得到了各自的指归。退溪还就韩康伯与朱熹言筮之异同、邵雍、朱熹论四象八卦之异同一一作了参订，显示其不凡的考订异同的功夫。

（二）考论援证之言，以见其义

考证援证之言，以明析文章的具体内涵，这是史学研究常用的一种方法。二十世纪，史学大师陈垣（1880—1971）开设“史源学实习”课程，“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，一一追寻其史源，考证其讹误，以练习读史之能力，警惕著论之轻心”[26]。今天，这门课程已变为一门专门化的学问——史源学。

退溪的研究方法虽无史源学之深切全面，但与之有相通之一面则是可以肯定的。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，退溪讲明了一些象数之义。如《本图书第一》篇中，退溪考证了《周易启蒙》注解中所引河图洛书旧说源于“临川吴氏”，即元吴澄，读者由此可通过吴澄的易学著作以识其义；又引《大戴礼记·明堂篇》，指明其数字“以每三字连续，盖横载洛书为三而言之”（第5页），不但对于明晰《明堂篇》之义有用，而且可以加深对《洛书》的认识。

退溪不仅考察史书援证之文，而且还长于自作考证。如他引《南村辍耕录》以证“古人做易章，也好则剧”（第154页）就是一例。

（三）疑难之余重生疑难，注解之中再作注解

象数易学极为复杂，牵涉面极广，往往使人生疑犯难。历代注解者释疑解难，但注解又复庞杂，所言过深，不易理解。古书多有注有疏，象数易学更需要多重解释。退溪认为学者对疑难问题的阐述往往又会引起新的疑难，而注解之中又引入多重内容，需要再作解释。

《易学启蒙》一书中，“《河图》义易见，《洛书》为难知”（第31页），但韩邦奇《启蒙意见》释《洛书》“第详其分图，拟数取义为说，殊未有定规，前后异同，多有晦紊难通处”（第32页）。这显然是“疑难之余重生疑难”。为此，退溪剥丝解棼，“因其大概，僭加櫛括修整”为图，“以发明韩氏之本意，不过如此”（第32页）。又如邵雍、朱熹在论四象八卦上有一定的差异，胡方平对此作了详细的辨析。退溪认为即便如此，“其义例颇有肯綮纠缠，未易领会，故为图以明之”（第61页）。他甚至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，认为邵雍之说有以四象、八卦当作两仪的用意，而朱熹仅仅用四象八卦为说而已。

胡方平解释“《河图》进退饶乏之正，互藏其宅之变”已是明白，但退溪仍不满意，又用阴阳之数的进退变化，逐条加以解释。他特意说：“胡氏之说已明，而读者未必得其意，故条

释之。”（第31页）从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，退溪分两个方面来解释原意。他一方面先从数的阴阳老少解释进退，再释饶乏，然后讲老阴老阳互藏之变，另一方面又从方位而言，先解释进退，再解释互藏之变，最后还对正变之别的原因加以分析。这种条分缕析的方式，对于读者来讲显然要层次分明、思路清晰得多。

朱熹对邵雍《大易吟》的注解也有不够清晰的地方，他说“自两角尖射上”[27]，“射上”难于理解。退溪解释说：“射上犹言贯上也，言否泰自角尖处直贯上，与乾坤相对耳。”

（第156页）“射上”源于《说卦》“水火不相射”，退溪的解释就明确了朱熹所言就是指《伏羲六十四卦方图》由否泰对角连成一条线，成泰、否、咸、损、既济、未济、恒、益八卦，与乾坤一线的八纯卦相对，卦画显得整然有序。显然，退溪比朱熹的解说更为清晰。

退溪注中加注也未必尽得原意。如朱子“一爻已成”注文中引有康节之说，退溪认为出自《皇极经世观物外篇》“易有真数，三而已”等说（第108页）。其实，朱熹引邵雍之说在于解释用挂卦数得出七八九六四象，并没有以三为真数，解说参天两地之意。退溪的注释说明他并没有理解朱子的原意，有过于求深而误入歧途之嫌。相比之下，胡方平《易学启蒙通释》卷下对此文的注解明确无误。

（四）明其隐奥之义

象数之学隐奥幽微为历来学者所公认，而明晰其隐奥之义又是学者之必需。在这方面，退溪本人虽有朱熹所批评的“深泥”之嫌，但通过他的努力，恰好为我们解开了疑团，而不为其所惑。纳音、六气之说是十分复杂的，退溪通过引证《素问》、《杨辉算法》为我们理解其意找到了好材料。汉代兴起的飞伏说，是通过隐显的对立卦象、爻象来解释卦爻辞的一种解《易》方法，但这种方法难于把握，义例不定。退溪则力求索其奥义，他先列出“隐晦难推”的《推伏例要诀》，然后“以乾坤二宫为图”，并加以按语，以明其义（第78—81页）。至于他解说洛书、蓍法、历算等内容均在于阐明象数学中的难点问题。

（五）正其传印之讹

退溪的正讹之法，首在义理，但辅以文本等证据。在《云台真逸手记》一文中，退溪记载时人有以“真逸手”为朱熹别号者，他以为手记是手录、手编、手校之意，不信其说。其后得善本，乃是“真逸手记”之脱文。韩邦奇《周易启蒙意见》一书，一种版本“意”作“臆”，退溪认为非是。他注释说：“朱子与陆子静论意见处，引诚意、毋意为说，可知非臆字义也。”（第6页）这又是援引他论，以证其说。退溪还有简单地列异文而加以订正的情况，如称“阳用老而不用少”之“阳，一本作易，是”（第96页），与今天所使用的某些校语极其近似。

退溪有以旧说为证者，如：“为九之子，一个十二，亦径一之义。此一个之一，旧说当作三。”（第88页）也有以他书为证者，如“朱子答或问曰‘本无间断’，间断，《语类》作前后，今当从之”（第68页）。“此留作流，疑当从之，即《易》所谓‘水流湿，火就燥’之义也。”（第81页）

在正讹上，退溪往往只用义理之法，而没有直接的证据。如：“二八居东为木，二当作三。”（第42页）“今馆本，‘他说图从中起’误作‘他图说从中起’，不可不察。”（第68页）“象四岁归奇于右，右当作左。”（第87页）“上文‘积三三一二之数’，上三字，

当作二。”（第88页）“十二当作二十。”（第93页）“挂当作卦。”（第102页）“三当作参。”（第104页）“三当作二。”（第107页）“也当作他。”（第150页）

综合考察退溪所用的“正其传印之讹”的研究方法，实际上就是利用了现代所称的校勘学方法来研究古籍刻印传抄之讹。依仿陈垣校勘四法而论，退溪不但用了对校法、他校法，也用了理校法，甚至还涉及到本校法。他的许多考订正讹之说有理有据，很有说服力，当然也有少数直接以理校的方式出现，并没有充实的证据，则是由于理显义明之故。退溪注重校勘古籍，显示了他研究学术的严谨性、科学性。门人鹤峰的记载尤为生动：“先生读书，正坐庄诵，字求其训，句寻其义，未尝以粗心大胆读之。虽一字一画之微，不为放过，鱼鲁亥亥之讹，必辨乃已。然未尝割改旧字，必旁注纸头，曰‘某字疑当作某字’，其详慎精密如此。”[28]对待《启蒙传疑》一书，退溪更是留心备至，不单与学人讨论其内容，更是反复阅读校勘。退溪在《答禹景善问目（〈启蒙〉）》一信中就禹景善提出的有关《启蒙》的数十种问题一一回答[29]，而与他人讨论订正者就更多。《答禹景善·别纸》说：“右前日为说大误，不自觉，乌川诸人看得出，因以修改，幸之甚！幸之甚！”[30]《答金而精》称：“《传疑》书前日草本，去年与禹景善诸人一再料理过，其间多所更定，各膳之本亦或自有异同，未会于一而诸人散去，今何可径以寄远耶？”[31]《答李刚而》则说：“《启蒙传疑》一再勘过，置之溪舍，而来后当奉还耳。夜灯眼暗，卦漏不一。”[32]又：“《启蒙传疑》今可奉还。每一阅过，辄有修改。既送后改，则难以遥改，故姑复留之，何必作急事耶？”[33]《答柳应见》又说：“《传疑》二册，谨具领受。但今精力耗乏，此等工夫，已不能如前日之锐意，尤可恨歉！”[34]

（六）详其乘除之法

易学中所谓的乘除之法，主要指揲蓍法，尤其是蓍策与历法结合后引出了策数的计算，朔闰余分的推演等复杂的数学问题，初学者往往不能明其法。朱熹在《易学启蒙》中基本上没有将蓍法与历法相混合，仅仅是阐述了揲蓍之法，以及如何用挂扚策数得出七八九六，老少阴阳四象。朱熹还针对郭雍《传家易说》作《蓍卦考误》，以辨挂扚法与过揲法优劣正误的问题。退溪没有就此止步，他不但引证郭雍、胡方平、韩邦奇等人论挂扚数等说法，还引入了传统的揲蓍与历法的结合，以推求其数。退溪说：“历算虽云置某数乘除，不蓍布算之法，初学未易晓，今悉为图如左。”（第70页）所以，他用图的方式，一一展示布算之法，虽然简捷便学，但离《易经》为远。

三、小 结

易学自其兴起以后，经过历代学者的推演发展，显得十分庞杂。清四库馆臣称：“易道广大，无所不包，旁及天文、地理、乐律、兵法、韵学、算术，以逮方外之炉火，皆可援《易》以为说，而好异者又援以入《易》，故《易》说愈繁。”[35]为此，传统目录书将易学分为正统易学与易外别传两类。象数易学与易外别传关系紧密，建立有别于易外别传的易学则是纯正儒家学者的重要工作。朱熹在此问题上有着清醒的认识。他在《易学启蒙序》文中指摘当时易学家“其专于文义者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，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傅会，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也”，所以其易学重纯朴，轻傅会，为后人所接受。清李光地奉敕编《周易折中》，在《凡例》中就明确说：“《易》之为书实根于象数而作，非他书专言义理者比也。”“后之学者言义理，言象数，但折中于朱子可矣。”

退溪正是在宗主朱熹易学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发展着易学。他的象数易学较朱熹而言，在很大

程度上扩展了研究的范围和深度，尤其是他毫无顾及地引入阴阳家诸书以言《易》，更打破了纯正易学家的禁忌。但从实践上来看，退溪是以学者的身份，从研究学术的角度入手来探讨象数易学的。在他的心目中，象数易学深奥微妙，落脚点仍在一个“理”字上，所以他反对琐碎和立异。他的研究方法也是以探究原理的方式进行的，可以说是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。如同朱子一样，退溪也谈蓍占，但他没有引入术士的占算之法，推算流年运命，更没有将重点落脚在“占”字上，其学术之纯正是没有问题的。退溪门人郑惟一在《言行通述》中记其言行也印证了这一点。其言曰：“又谓数学非理外之书，自癸丑（1553年）以后兼治数学。谓朱子《启蒙》一书乃数学之祖，而多有未解处。玩索多年，洞究其原，乃著《启蒙传疑》，发挥分解，殆无遗蕴。晚年多以《启蒙》教授学者。”[36]退溪认为《易学启蒙》一书于初学工夫也是亲切的，称“若于此书熟读详味久久，实体呈露，目前事物无非这个”[37]。他还教导郑士诚读《启蒙》一书，要向赵士敬一样，“不可泛泛看过”[38]。

退溪对象数学如纳音、纳甲、飞伏、历算、变占等的深入探讨虽有朱子所批评的“支蔓”之嫌，但正是他的进一步考究，不但为我们理清了前辈学者各自研究中不同表述的内在涵义，而且指明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异及其用意所在。此外，他引入阴阳家诸书，如《卜筮元龟》以言占，比较朱子变占之说与这些书的差异，让我们更深入地明白朱熹易学中来自术数筮占之学的影响，领会其真实用意。可以说，退溪用较为通俗纯正的方式理清了象数学中一些神秘的、扭曲了的艰深问题。其方法和内容都富有指导性意义。

作者简介：金生杨（1974—），男，重庆万州人，四川大学古籍所专门史博士生、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，主要从事儒学、文献学研究。

[①] 黄德昌《退溪易学的〈河图〉〈洛书〉观》，《宗教学研究》1997（3）；吕绍纲《退溪易学初论》，《周易研究》1998（4）；吕绍纲《再论退溪易学》，《周易研究》，2003（1）；刘蔚华《退溪〈易〉学思想初探》，《济南教育学院学报》，2000（1）；等。

[②] 《朱子语类》卷67，中华书局1994年，第1650页。

[③] 《朱子语类》卷139，第3320页。

[④] 《周易本义》卷5《周易象上传·履》、卷6《周易象下传·夬》、卷9《文言传·坤》，萧汉明导读本，齐鲁书社2003年，第199、216、266页。

[⑤] 《朱子语类》卷67，第1654页。

[⑥] 《朱子语类》卷67，第1651页。

[⑦] 《朱子语类》卷67，第1653页。

[⑧] 朱熹《伊洛渊源录》卷5：“晁以道尝以书问康节之数于伊川，伊川答书云：‘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年余，世间事无所不问，惟未尝一字及数。’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[⑨] 《朱子语类》卷19：“《易传》不看本文亦是自成一书。”第438页。

[10] 《退陶先生言行录》卷5，贾顺先主编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五册第844页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。

[11] 《朱子语类》卷67，第1652页。

[12] 李滉《启蒙传疑》卷首序，贾顺先主编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六册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。以下凡出此书者仅括注页码于后。

[13] 《朱子语类》卷66：“《火珠林》犹是汉人遗法。”第1638页。

[14] 《朱子语类》卷77：“伊川之在涪也，方读《易》，有箍桶人以此问伊川，伊川不能答。其人云：‘三阳失位。’《火珠林》上已有，伊川不曾看杂书，所以被他说动了。”第1976页。

[15] 《朱子语类》卷67，第1669页。

[16] 《朱子语类》卷66，第1642页。

[17] 《朱子语类》卷66，第1643页。《周易本义》卷2《周易下经·大壮》六五：“卦体似兑，有羊象焉。”第125页。

[18] 《朱子语类》卷67，第1651—1652页。

[19] 《朱子语类》卷66，第1634—1635页。

[20] 《朱子语类》卷92，第2340页。

[21] 《朱子语类》卷67，第1673页。

[22] 《周易参同契考异》卷首附录，《朱子全书》第拾叁册，第530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。

[23] 《周易参同契考异》卷首附录，《朱子全书》第拾叁册，第530页。

[24] 《退溪先生文集内集·书·答郑子中》，贾顺先主编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三册第908页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。

[25] 《退溪先生文集续集》卷3，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五册第173页。

[26] 《陈垣史源学杂文》卷首《前言》引，人民出版社1980年。

[27] 《朱子语类》卷65，第1613页。

[28] 《退陶先生言行通录》卷2，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五册第566—567页。

[29] 《退溪先生文集内集·书》，贾顺先主编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四册第223—251页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。

[30] 《退溪先生文集内集·书》，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四册第218页。

[31] 《退溪先生文集内集·书》，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四册第144页。

[32] 《退溪先生集续集》卷2，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五册第136页。

[33] 《退溪先生集续集》卷2，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五册第137页。

[34] 《退溪先生集续集》卷4，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五册第210—211页。




[35]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经部易类小序，中华书局1965年，第1页。

[36] 《退陶先生言行通录》卷1，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五册第536页。

[37] 《退陶先生言行通录》卷2、《退溪先生言行录》卷1，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五册第573、1001页。按：《退溪先生文集内集·书·答郑子中》（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三册第811页）：“《易》乃理数渊源之书，诚不可不读，但不如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庸》、《学》之切于学者日月工夫。”《李子粹言》卷2引《答郑子中》（贾顺先主编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一册第584页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）称：“有汉城人金命元来此读《易》。象数之学，虽亦为性理之源，玩养之助，然于身心日用工夫不甚亲切。每日讲究数卦，便觉疲倦，无精力可及他书，殊浪过了日子。”《退陶先生言行通录》卷2（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五册第556—557页）又有鹤峰录载：“问：‘《启蒙》等书，似不切于初学，何如？’先生曰：‘固是，然学者不可不先知先儒有是说耳。’”可见，退溪于《启蒙》一书是否于初学亲切在态度上先后还略有差异。

[38] 《退陶先生言行通录》卷2、《退溪先生言行录》卷1，《退溪全书今注今译》第五册第573、1002页。

（《尤溪首届朱子文化研讨会学术论文集》，第374~390页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）

 [关闭窗口](#)  [发表, 查看评论](#)  [打印本页](#)

发表日期：2006-9-26 浏览人次：411

版权声明：凡本站文章，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。任何网站，媒体如欲转载，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。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。